

论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以国家税收为视角

袁 德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上海

收稿日期: 2024年12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5年2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5年2月20日

摘要

英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也表现在其国家税收的变化上。通过对比在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几个世纪间的英国税收，我们可以发现：英国的税收规模不断增大；关税等商业税代替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乡绅与市民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行政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加大。而英国税收在这一段时间中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其社会产业结构与阶级结构正在逐步地迈入资本主义。

关键词

英国史, 资本主义过度, 税收

On the Transition of England from Feudal to Capitalist Society —National Taxation as a Perspective

De Yuan

Department of World Histor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Dec. 30th, 2024; accepted: Feb. 10th, 2025; published: Feb. 20th, 2025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British society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was also manifested in the changes of its national taxation. By comparing British taxation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and the early modern centuries, we can find that: the scale of British taxation increased continuously; commercial taxes, such as tariffs, replaced agricultural taxes as the main taxes; the squire and the citizen class became

the main taxpayers and gradually took part in the politic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ccounted for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s. The reason for such changes in British taxation over the period of time was that its soci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lass structure were gradually moving into capitalism.

Keywords

English History, Transition of Capitalism, Tax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欧洲史领域，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是战后国际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个热点。在国外，它“是由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和经济史研究著作引起的，随后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展开了争论”[1]，而当它被国内学界关注到以后，受到的研究也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展开的。因而在今天，我们看到的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是从工农业生产力的革命，或者社会阶级关系的变革这类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切入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这一问题本身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因此不妄以任何新的理论或模式来挑战现有的相关学术成果，而是试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以英国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的国家税收在税种、税收收入、税法制定者、纳税人、税收用途等方面的对比，展现英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并说明这一转变的原因。

2. 税收及税种规模

在 14 和 15 世纪，税收的封建性特征已经开始减弱，这体现在当时英国税收中几大主要税种所占比例的变化上。当时的三种主要税种，即土地税、动产税与关税中，虽然属于农业税的土地税与动产税提供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收入来源于商业贸易的关税相对较少，但后者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土地税向土地上产出的收入和俸禄工资收税，其纳税人是国内的地产所有者。根据对 15 世纪的 5 次土地税征税记录所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 1401、1404 与 1411 年，纳税主体都是国内的地主，税收收入也在 1000 英镑上下；而到了 1435 年与 1450 年的两次征税时，纳税主体在地主的基础上又多出了自由人、雇工和官吏，收入也陡然上升到了 8000 英镑以上的规模[2]。动产税(Movable Tax)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并由议会批准后才可以征收，长期以来税率不固定，直到 1332 年才固定为城镇十分之一，乡村十五分之一。爱德华三世(1327~1377 年)在位期间曾征收过 25 次动产税，征收总额为 880,400 英镑，平均每次征收到 35,216 英镑[3]。这一时期的关税(Customs)主要是针对进出口贸易中的羊毛、毛坯和皮革征收，并且可以由国王常规性、持续性地征收，而只需要在其即位之初获得议会的一次性授权。同样以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的关税举例，1338~1339 年的关税收入为 65,000 英镑，1345 年为 50,000 英镑，1351~1362 年为 87,500 英镑，二十余年间的总额为 202,500 英镑[4]。除了农业税收入远远大于商业税外，中世纪末期税收的封建性特征还表现在人头税的征收上。自从 1377 年议会批准爱德华三世为百年战争筹措军费而征收人头税开始，他在四年间就进行了三次的征收。虽然后两次征收都相较前一次做出了改进，尝试按财产多寡征收并让富人补助穷人，但大体上仍然是按照人头来征收的，财产数额相差悬殊的富人与穷人需缴纳的

税额却相差无几，1377 年人均缴税 4 便士，1380 年则是人均 12 便士[2]。

到了 16 世纪，英国财政收入的构成情况便与中世纪时有了明显的不同，商业税变得更加常规且逐渐成为了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相比之下农业税的地位则不断降低。这时的关税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多出了如葡萄酒入口税(亨利七世于 1490 年开创)这样的新关税；另一方面关税的主体由羊毛出口税转变为了呢绒出口税，又因重商主义的影响，后者的税率要比前者低，致使关税收入有所下降，但关税在财政中的主体地位并未因此受到动摇。1505 年的关税收入为 27,000 英镑，1540 年为 40,000 镑，1559 年为 8300 镑，1590 年更是达到了 100,000 镑，远远超过动产税收入[5]。而动产税由于征收条件十分苛刻，即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征收，而且税率固定，不能成为一项常规性税收，因而动产税在国王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每一次征收动产税能给国王带来 30,000 英镑上下的收入。1514 年亨利八世经过议会允许设立了新补助金(Subsidy)这一新的综合性财产税，它与土地税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向土地产出的财富，还向所有领域的财富征收，并且只选择纳税主体所有财产中价值最高的一种进行纳税[6]。新补助金具有很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而非封建性。亨利八世初次收税时税率为 6 便士每英镑，税收总额为 14,637 镑；玛丽一世在 1547 年征收时向价值 20 英镑以上的土地征收 4 先令每镑，动产征收 2 先令 8 便士每镑，不足 20 镑的土地与动产则降低税率，一共获得了 120,000 镑的收入[7]。与此同时，16 世纪的人头税也变得更加像是财产税，亨利八世于 1512 与 1514 年两次征收人头税，但都根据纳税人的社会与财产等级制定了不同的税率：公爵 10 马克(合 6.6 英镑)，侯爵与伯爵 4 镑，男爵 2 镑，骑士 30 先令，财产 40 镑以上者 20 先令，财产 20 至 40 镑者 10 先令，如此递减[6]。

3. 税收的来源与用途

英国国家财政能够展现出社会正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主要纳税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中世纪时，国家税收中的很大一部分由封建贵族向国王缴纳的封建贡赋提供，包括盾牌钱、协助金、继承金、监护金、婚姻捐等各种名目。但到了中世纪末期，封建贡赋越来越少，以国王在子女结婚时向贵族征收的协助金为例，13 世纪时仅亨利三世就征收过 4 次，14 世纪时爱德华一世征收过 3 次，而等到 15 世纪亨利四世统治时却仅征收了 1 次[2]。与此同时，乡村骑士、富裕的自耕农、商人、律师、医生、学者甚至低级教士却逐渐成为纳税的主体，根据居住地与主要所从事行业不同，我们一般将他们分为乡村地区的“乡绅阶层”，以及城市的“市民阶层”。相较于只会经营地产、却又不善于经营地产的大贵族，他们更乐意从事商业活动，以当时新兴的手段经营土地，又或者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城市里拿着一份不错的薪俸，名下财产富裕，同时生活中的消费支出也相当可观。

由于纳税主体的变化，税法制定者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254 年乡绅加入议会，1265 年市民加入议会，到 1341 年议会确立上下两院的组织形式，其中的下院主要是由乡绅阶层与市民阶层组成的[3]。下院通过行使批准与监督两项权力来参与税收制度的制定。例如在 1340 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未经议会中的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和平民的同意，国王不得征收任何赋税；同年议会任命专人审查王室的收入账目。1343、1355 与 1362 年关税的征收都先经过了议会的批准。1379 年国王在议会要求下将当年的账目交给后者审查，甚至还主动将前一年的账目也出示给了议会[8]。

在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国家行政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且通过国家财政支出表现出来。国王的收入分为常规性的王室领地收入和封建法收入，以及需要议会同意的税收收入两部分[9]。中世纪时，国家行政的开支全由国王的常规性收入负担，而等到 14 与 15 世纪，“仅靠王室收入来维持政府运作的方法已经很难适用，因此国王所征税收有很大一部分用在了维持日益扩张的政府行政职能上，爱德华六世时期，有近一半的税收收入要用于王廷开支和官员俸禄这些行政职能的维持上”[3]。从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在 15 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英国国家财政支出的 95% 左右都被用于战争，而行政支出只占了总

支出的 5%左右[10]。而到了 1571 至 1572 年的半个财政年度中，动产税总收入 64,744 英镑，其中有 29,224 镑都用于正常开支，而不是属于军费的特殊开支，占比约为 45%[6]。随着直接税收入的增加与国王不断把特别收入用于正常开支，都铎王朝(1485~1603 年)开启了英国建立近代国家公共财政体系的进程[11]。

4. 税收转变的原因

英国在这几个世纪之中税收发生如此转变的原因当然是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的转型。这种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与社会阶层两个角度来认识。由于 14 世纪的黑死病、15 世纪的圈地运动与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的连续作用，英国的封建农业经济不断遭受打击并逐渐解体，乡村中的自耕农经济被大地产所有制与资本化的农业生产所替代，农业生产力大幅上升。在 1450 年至 1650 年之间，英国的小麦亩产量增长了 30%。在中世纪末期，英国小麦、马铃薯、亚麻三种作物的亩产量分别为 275 斤、574 斤以及 115 斤；而法国相应的产量为 183 斤、368 斤、95 斤，意大利为 207 斤、253 斤、31 斤[12]。英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大超过了同时期的法国与意大利。

在农产品产量大幅上升的同时，英国乡村的畜牧业与手工业增长也不容忽视。它们的产品，羊毛与呢绒，被大量出口到国外市场，同时也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关税收入。14 世纪末期英国每年出口羊毛 19,000 袋、呢绒 43,000 匹；15 世纪中期羊毛减少为 8000 袋，呢绒增加为 54,000 匹；16 世纪中期呢绒出口更是上升为 160,000 匹，而羊毛则在出口中已经不占重要地位。甚至有学者估计，“自都铎王朝以来至 1660 年，羊毛及毛制品出口占全部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三，有时甚至超过十分之九，对英国人来说，13、14 世纪的出口贸易跟羊毛是同义语”[13]。关税与动产税收入大幅上涨，而国王为了更好地收取这笔商业税，不得不扩建国家行政机构、完善财政制度，也就促进了英国国家机构与社会一起朝着资本主义过渡。

社会阶层上，旧的封建贵族不断衰落，而乡绅和市民阶层则逐渐兴起。商业的持续繁荣带来了物价的飞速增长，当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迎来价格革命的冲击时，封建贵族们还在用中世纪的方式经营土地，即以一份长达几十年的长期契约将土地出租出去，仅凭这份契约带来的租金生活。而这样一来，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同时，他们不仅获取不到地价上涨带来的收益，还不得不以几十年前的相对微薄的租金收入来支撑家族日益庞大的开销，于是大多陷入经济上的窘迫地位，不得不靠出售土地来维持生活。而从他们手里购买土地的人可能是商人、自耕农，甚至为了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律师和公务员，这些购买者一般与乡村骑士等中小地主一起被合称为“乡绅阶层”[14]。乡绅拥有的地产规模在自耕农与贵族之间。他们通常采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经营农牧业：雇佣人手来经营一部分土地，再把剩余的土地以短租期、高租金的模式出租出去，获得了远超封建经营方式的收益。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乡绅们也积极要求政治上的权力，如前文提到的他们与市民阶层一起掌控了议会的下院，甚至在 16 与 17 世纪阻止了许多禁止圈地的法案，提出反专利权的法案，与王权发生冲突[15]。

5. 结论

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是社会生产方式与阶级结构同时发生变化的结果，而这种过渡又在同时期的国家税收中表现出来。工商业繁荣、乡绅与市民阶层崛起而旧贵族衰落，于是商业税代替农业税成为国家财政的主体，新兴阶层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承担者与税制制定的参与者，财政支出也不断向日常性的行政支出倾斜，英国社会就这样迈入了资本主义的领域。

参考文献

- [1] 沈汉. 国外对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之评述[J]. 史学月刊, 1995(2): 102-109.
- [2] 施诚. 中世纪英国财政史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3] 冯巾桐. 英国税收法律制度变革与政治转型(13-17世纪)[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 [4] 马克垚. 英国封建社会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5] 周均. 英国都铎王朝的财政结构及王权和议会的关系[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 49-53.
- [6] Hoyle, R.W. (1998) Taxation and the Mid-Tudor Crisi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1**, 649-975.
<https://doi.org/10.1111/1468-0289.00109>
- [7] 陈曦文, 王乃耀. 英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8] 滕淑娜. 英国近代赋税的来源与用途[J].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3(1): 61-74.
- [9] 程汉大. 十四世纪英国议会的发展[J]. 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1): 9-16.
- [10] 刘昀. 14-17世纪中英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 [11] 施诚. 英国都铎王朝的税收与财政[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3): 101-106.
- [12] Coleman, D.C. (1977)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3] 周广远. 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J]. 世界历史, 1982(1): 16-27.
- [14] Maurice, A. (1967)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Penguin Books Inc.
- [15] 王乃耀. 试析英国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3): 17-22+16.